

用《水浒》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评论《水浒》参考资料（讲话稿）

中文系写作组

《水浒》是一部歪曲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的长篇小说。从元末明初成书以来，在我国广泛流传，影响很坏。几百年来，对它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解放后，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影响下，仍然被一些人当作进步的作品来宣扬，更使人们对这部书的性质模糊不清。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这部作品呢？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美化投降派的本质，揭露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广泛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必将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的深入发展。

《水浒》这样一部宣扬投降主义、丑化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长期以来，被有的人吹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宋江这样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投降派，被美化成“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他搞修正主义，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则被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就完全混淆了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对立，抹煞了坚持农民革命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歌颂《水浒》中的宋江，同美化《武训传》中的武训一样，都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这些人不是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对于《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必须彻底批判。

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彻底澄清《水浒》评论中的错误观点，我们可以汲取历史教训，认识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懂得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水浒》中的宋江，和刘少奇、林彪等现代投降派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投机革命、修正革命路线、叛变投降的反革命生涯。认识了投降派宋江，弄清他是怎样修正和篡改梁山农民起义路线、断送农民革命成果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露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真面目，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坚持下去，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一、《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对《水浒》作了最正确的评价。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露和批判《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

歪曲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官逼民反说成“奸”逼“忠”反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北宋时期，封建社会已开始走下坡路。公元九六〇年创建的北宋王朝，是一个非常腐朽的封建政权，豢养了一百几十万反动军队来维护它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一系列的赋税、徭役制度，敲骨吸髓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土地高度集中，不少大官僚一家就霸占了数十万亩土地；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北宋后期宋徽宗统治的年代，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享乐，在苏州特设“苏杭应奉局”，派朱勔等爪牙到东南各地强行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奇物品，兴建宫殿林苑。“应奉局”将搜刮到的物品用大批车船向东京（今河南开封）运送每十车（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统治阶级的搜刮，使得“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把广大劳动人民搞得倾家荡产，困苦不堪。加上汉族地主政权与辽、西夏贵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又一再失利，最后屈辱求和，每年“以百万计”的白银、丝绸、茶叶送与辽和西夏的统治者，用人民的血汗换取朝廷的苟安。劳动人民不堪忍受这重重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以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公元一一一一年，宋王朝将梁山泊收为“公有”，农民进入泊中捕鱼、采莲，都要缴税，即使荒年也不能减免。在这样的残酷压榨下，许多贫苦农民被“逼上梁山”，参加了起义队伍。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一二〇年）南方也爆发了以方腊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可是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却违背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

农民起义明明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逼出来的，《水浒》却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开脱罪责。小说一开头，就为赵宋王朝大唱赞歌，说什么“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又说“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皇帝是“圣明”的，只是少数奸臣背着皇帝“屈害忠良”，才引出梁山一百单八人与高俅一类奸佞的矛盾和斗争。就这样，一场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被作者偷天换日歪曲成地主阶级内部宋江等所谓“忠臣”与高俅等奸臣的矛盾和斗争。这是掩盖农民与地主这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美化封建统治，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提供根据。

农民起义明明是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推翻地主政权。《水浒》却大写宋江等人被逼上梁山“权居水泊”，“本无异心”，“安敢反逆圣朝”，“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一部《水浒》就是通过宋江同高俅的奸诈，以及同李逵的“反心”之间的矛盾的情节，来表现“造反为招安”的主题，歌颂宋江的“忠义”，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

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这部小说写了梁山泊农民起义从逐步发展壮大到接受招安、充当宋王朝帮凶的全

过程，歌颂了宋江推行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在前二十回中，写了梁山起义的酝酿、爆发和起义基地的建立。中心事件是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东溪村聚义”和“智取生辰纲”，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私放晁盖，建立梁山起义的基地等。在这一部分，作者虽然用了一些笔墨来描写晁盖等人的革命活动，但这些情节都是为宋江的出场和以后上梁山作准备，为后来宋江取代晁盖的位置准备条件。《水浒》的作者并没有让晁盖作为该书的主人公，也没有让晁盖的起义路线继续发展，而是迫不及待地把宋江作为该书的中心人物抬了出来，送上梁山。这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不是歌颂晁盖和他的起义路线，而是把他作为宋江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陪衬来写的。

《水浒》第二十一回至六十回，主要写宋江走着曲折的道路上了梁山和宋江上山以后的梁山起义军的活动。作者着重突出了宋江在一系列的重大的军事行动（如三打祝家庄、攻高唐、打华州等等）中的作用，扩大宋江的影响，为宋江代替晁盖进一步作好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接着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宋江爬上了梁山寨主的宝座。《水浒》之所以这样处理，作者已有明确的招供，就是：“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唯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这就是说：晁盖胆敢蔑视皇权，对抗北宋朝廷，实行革命造反的路线，合该早上西天，而宋江“尽忠报国”、“替天行道”，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接受招安，理应做梁山的领袖。《水浒》一书仇视农民起义，鼓吹叛变投降的反动本质，不是昭然若揭吗？在这一部分，作者还通过“玄女法旨”来神化宋江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把它说成是上天的意志，用“天命论”作为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把接受招安说成是神圣而不可抗拒的。

《水浒》的后半部，从第六十一回至一百二十回，通过描写宋江上台以后怎样把起义军引上接受招安，怎样去打方腊等，极力赞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妄图说明接受招安，向封建统治者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正确出路。八十二回以前，着重写宋江的招安和李逵等反招安的斗争，宋江接受招安的路线的“胜利”；八十二回以后，写宋江被招安以后，怎样利用农民起义军去征辽、镇压王庆、田虎、方腊等“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为封建皇帝立下汗马功劳，受到皇帝的封赏，最后虽然被高俅等奸臣毒死，但却得到了封建皇帝的“封妻荫子”，“建庙封侯”，永传“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在这一部分，作者也写了李逵、吴用等人多次反招安的斗争，但都以他们最后屈服于宋江的投降路线而告终，用以说明宋江从九天玄女那里领受来的“替天行道”的投降路线的神圣不可抗拒性。为了这个目的，《水浒》极力歪曲和丑化革命派，甚至把反投降的李逵等革命派写成终于跟着宋江一起去受招安、征方腊，并特意让李逵在喝了宋江的毒药酒之后还说“我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水浒》把革命派写成最终跟着投降派跑，妄图证明投降派如何深得大家拥护，这正好彻底暴露了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

《水浒》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还表现在对封建皇帝的无耻吹捧上，说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只是被“奸臣闭塞”了。因此，农民起义军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于是作者就安排梁山起义军去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打击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贪官。这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丝毫不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政权的总代表，封建官吏的总后台。高俅这些人能够胡作非为，就是因为有皇帝这座大靠山，有封建政权的保护。其实，在皇帝的卵翼下，封建官僚无官不贪。把封建官僚分为“贪官”和“清官”，是封建皇帝为欺骗革命群众，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骗人手法。《水浒》的作者就是以此为根据来虚构《水浒》的故事情节的。

孔孟之道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思想武器

赵宋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用反动的孔孟之道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精神统治。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不写起义大军的反孔斗争，不写他们如何冲破孔孟反动思想的束缚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大肆鼓吹“天命论”、“忠、孝、仁、义”一类的黑货，为宣扬投降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整部《水浒》不仅充塞着“因果报应”、“天命注定”、“皇权神授”的黑货，塑造了宋江这个孔孟程朱理学的黑样板，而且对他用孔孟之道把农民起义引向受招安的邪路百般吹捧。与此同时，还大力赞扬宋徽宗的“怀柔”政策：“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夷伤。”《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不是很清楚了吗？作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不也是很清楚了吗？

《水浒》宣扬投降主义，集中表现在它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下面我们着重来分析一下宋江这个人。

二、宋江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恩格斯指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主要是通过歌颂投降派的典型宋江和他推行的路线来宣扬投降主义的，要弄清《水浒》的反动本质，就要着重分析《水浒》竭力歌颂的宋江到底是个什么人。

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

宋江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尽忠报国”、“忠义双全”、“仁义礼智信皆备”的艺术典型。他是山东郓城县衙门的押司，一出场亮相，就称赞他“自幼学儒”、“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于家大孝”，把他打扮成“赍人之急，扶人之困”、山东、河北闻名的“及时雨”，“能救万物”的救世主。《水浒》作者用这些“美好”的词语吹捧宋江，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满脑都是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刀笔吏”，梦寐以求升官晋爵的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水浒》作者在对宋江美化一番之后，又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私放晁盖的情节。宋江听说晁盖等人夺了“生辰纲”，朝廷要缉拿他，急忙跑去通风报信，便对晁盖说：“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兄弟，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这样一来，宋江俨然成了晁盖的救命恩人，为他日后上山篡权埋下伏笔。

作者写宋江的上山与众不同，几经曲折。宋江杀阎婆惜后，弃官潜逃，并没有上梁山。起先投靠世袭贵族柴进的门下，接着跑进孔太公的地主庄园，最后窜到朝廷命官花荣的清风寨里。“大闹清风寨”后，宋江无处安身，“乘兴”带着花荣、秦明等人投奔梁山，在往梁山的路上碰见石勇，带来他父亲病死的假信，“宋江读罢，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水浒》这样写，不仅是歌颂宋江的“驰名大孝”，而且是突出他“誓死尽忠”。在作者看来，孝是忠的基础，只有对父尽孝，才能对君尽忠。孔老二有个叫有若的学生曾经说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把“孝”作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他们提倡孝道就是防止人们犯上作乱，《水浒》宣扬“孝”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吗？当然，象宋江这样的大孝子怎么会犯上作乱呢？那是绝对不会的。后来宋江虽然上了梁山，但他却“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对皇帝仍存一片忠心。这封

假信使得宋江又没有上成梁山，却中途开了小差，连夜赶回家奔丧去了。回到家中，父亲还活着，自己却被官兵抓到县里，被刺配江州。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害怕沾梁山的边，绕道而行，但还是遇上了梁山好汉。晁盖等人再三劝他上山，他以“上逆天理，下违父教”，横加抗拒。花荣问为什么不打开枷锁？他却斥责花荣：“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水浒》这样写的用意是歌颂宋江的“忠孝”，我们却可以看出宋江是个“万劫不复”的奴才。他宁可带着枷锁去江州做阶下囚，也不上梁山。到江州后，“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被蔡九知府定成死罪。晁盖、李逵等劫了法场，把宋江从反动派的屠刀下救了出来，才“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作者让宋江上山走着曲折的道路，一方面要说明宋江的上山并无“反心”，另一方面为了在上山之前，就把他装扮成“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及时雨”，似乎只有宋江上山，当梁山的领袖，梁山的起义事业才能得到发展，为他上山篡权再次埋下伏笔。

在宋江上山之前，《水浒》除对宋江进行许多露骨吹捧之外，还为他挂了放晁盖、题“反诗”两块骗人的金字招牌。

有人说，宋江私放晁盖是什么同情和支持革命。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官府要捉晁盖而宋江却去通风报信私放晁盖呢？宋江私放晁盖，是叫他走，去躲一躲，避避风，使自己落个“仗义”的美名，扩大他在江湖上的影响，为向上爬捞取政治资本，同时，利用所谓“义”进行政治投机，给自己留条后路，而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他对晁盖取“生辰纲”，伤了何涛、活捉黄安上山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所以，宋江私放晁盖，丝毫不能掩盖他反对农民革命的立场。

有人说，浔阳楼上题“反诗”是宋江造反的开始。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

宋江在江州牢城，一日在浔阳楼上喝酒，想起自己“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成了一名囚徒，不觉感恨伤怀，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接着又在词后面写了四句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水浒》作者借这两首诗来歌颂、美化宋江，我们却从诗中看出一个地主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自白。这两首诗根本不是什么“反诗”，而是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自供状。诗中流露的情绪决不是对宋王朝的不满，而是他在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失意时的牢骚而已。那首词，是说他从小读孔孟的书，长大后又善于权变而有谋略。在宋江看来，有这样的才干，理应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可恨高俅一伙，独揽朝政，“屈害忠良”，使得他年过三十，名利空空，倒落到刺配江州的难堪境地。于是他和高俅这些地主阶级当权派之间就结下了冤仇。他想报的正是这种个人的私仇。这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要报阶级仇，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完全有着本质的区别。至于那首七言绝句更是地主阶级野心家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时若遂凌云志”就是很好地说明。他的所谓“凌云志”，无非是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穷愁潦倒的宋江，知道要实现“凌云志”走老路已不行了，决心投机混入起义队伍，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捷径”，以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去换取朝廷的一官半职，实现他升官发财的“凌云志”。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自号“冲天大将军”，敢“冲”封建王朝的天，敢把唐朝皇帝拉下马。宋江嘲笑黄巢“逆天”造反，不“顺天”招安，坚持起义，有“官”不当，有“福”不享，算不了什么“大丈夫”。他表示自己决不走黄巢起义的道路。所以，浔阳楼题“反诗”并不是什么造反的开始，而是透露他要“潜伏爪牙忍受”，窥测方向，走另一条反革命道路。

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野心家

晁盖救了宋江的命，在上梁山的路上，他对晁盖山盟海誓，表示“要与哥同死同生”。但一上山就开始了篡权活动，他凭借私放晁盖的资本坐了第二把交椅。随即，他抢在晁盖前面，发号施令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在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在右边客位上坐”，结果左边只有林冲，三阮等九人，右边却有二十七人。吃庆喜筵宴时，宋江又在众头领面前解说京师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耗散国家钱粮的必是家字头作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在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宋江刚上梁山就迫不及待地拉山头、搞分裂，又借京师童谣吹嘘自己，为他篡权制造舆论。“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的背后隐藏他篡夺梁山起义军领导权的狼子野心。

宋江上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他地主父亲上山。宋江走到庄子后面，听说官兵正等着捉人，他转身便走。为了逃避追捕，躲入神庙，梦见九天玄女授书，并聆听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忽忘勿泄。”《水浒》特意安排这个情节，不仅是宣扬“天命论”的需要，而且借神灵之助，把宋江神化成上应“天命”的“星主”，把宋江搞投降、受招安神化为上应“天言”，完全合乎天意，为他推行“替天行道”、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用以欺骗迷惑读者。从此，有了“玄女”的“护祐”，他的篡权活动就更加嚣张。

回到梁山后，宋江拚命抓权，抓权为了篡权。每当山寨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不让晁盖出马，抢着带兵出征，好将军权抓到自己手里。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妄图使晁盖无所作为，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头司令”。同时偷偷篡改晁盖的路线和政策，公然违背晁盖处理反动军官黄安的先例，背着晁盖提出“受招安”的口号，大搞招降纳叛的活动。每俘获一名朝廷军官，他总要“亲解其缚”、“请入帐坐”、“纳头便拜”，声言“暂借水泊权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完全是一副奴才相。宋江一方面拚命抓权，架空晁盖；另一方面又背着晁盖提出“受招安”的口号，篡改晁盖“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起义路线，招降大批朝廷军官，为篡权积极准备。

晁盖对宋江的篡权活动已有所察觉，决意亲自带兵攻打曾头市。然而《水浒》却特意安排晁盖中箭身亡，这就替宋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扫清了障碍。

大搞修正主义的头子

宋江搞修正主义，经历了一个从隐蔽到公开的过程。

晁盖在世，他慑于晁盖作为梁山起义根据地开创者的崇高威信，还不敢公开推行他的受招安路线，只在暗中活动。晁盖一死，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他就明目张胆“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窃取了梁山泊的领导大权。他一上台就宣布：“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发布了第一个号令：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一块“忠义堂”的横匾，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标志着宋江彻底改变了晁盖的起义路线。把晁盖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是披着革命外衣搞修正主义

的，忠义堂上仍供奉着“托塔天王”晁盖的神主牌位，表面上装出继承晁盖事业的样子，口里喊着要为晁天王报仇雪恨。这是宋江这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搞修正主义极其狡猾的一手。

宋江抛出“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之后，就进一步拚凑搞投降的班子。他上台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请卢俊义上山。宋江很清楚，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虽然排除了，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阻力还很大，还有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反对投降。首先是吴用，他是同晁盖一同起义的，是晁盖领导武装起义、开创梁山根据地的主要助手，在起义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让吴用继续掌握军政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下决心改组领导集团，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大名府的富豪、农民起义军的死敌卢俊义拉上山来。宋江说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贵人之相”，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排在吴用之前，作为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得力干将。此外，宋江还网罗了蒲东巡检关胜、兵马因练使单廷珪、魏定国等大批朝廷军官。

宋江经过长期苦心经营，构成了以他为首的投降派核心领导集团，“众弟兄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实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又装神弄鬼，搞阴谋诡计，蒙蔽群众，对起义军进行反动的思想统治。宋江打完东平、东昌两府归山之后，设一“罗天大醮”，请僧道做了“七昼夜好事”，感动了上帝，“天门”大开，“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钻入正南地下”，跟踪挖出一块石碣。经何道士辨认清楚，乃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以宋江为首，卢俊义为次，排定座次，使“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借此机会说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苍分定位数……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他唯恐众人不服，又搞了一百〇八人共同遵守的誓言，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美化成“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谁不执行，就要“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要大家歃血为盟，“同声共愿”。《水浒》作者玩弄“天命神意”的花招，把宋江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天命注定的。宋江则利用“天命神意”来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至此，忠义堂前挂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做好了准备。

宋江见自己地位已经巩固，满以为一切准备就绪，在重阳赏菊的会上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公开地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曲。革命派对宋江的投降行径再也不能容忍了。李逵怪眼圆睁，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翻，搯做粉碎。”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鲁智深则声明要招安便散伙。宋江见竟然有人反对招安，就凶相毕露，大喝道：“这黑厮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拿李逵开刀，以杀一儆百。这是投降与反投降第一次公开的斗争，由于宋江大权在握，又有卢俊义一伙投降派的支持，再加上宋江巧言软化，使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占了上风。

大搞乞降活动的奴才

宋江把反投降的意见压下去以后，急于要“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就进一步为接受招安从各方面进行可耻的乞降活动。

“菊花会”后不过三个月，宋江借元宵看花灯为名，带着柴进等人溜进东京，用一百两黄金的贿赂走赵官家的宠妓李师师的“后门”，企图向那位风流皇帝“告一道招安赦书”。为了投降，他在娼妓面前摇尾乞怜，写了一首“尽诉胸中郁结”的《乐府词》，实际上是一张投降的自

白书。词中说什么“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意思是说，梁山一百〇八人都自知犯了大罪，正在等待大赦招安的消息。这就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钻进农民起义队伍是为了投降，以参加农民起义作为受招安时向赵宋王朝邀功请赏的资本。当宋江正在“打通关节”的时候，那个腐朽皇帝来了。宋江连忙躲在暗处，眼巴巴地望着皇帝，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今番挫过，后次难逢”，急想跪在皇帝面前“告一道招安赦书”。李逵对宋江的卑劣行为极为厌恶，“毛发倒竖，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只见陪同皇帝的杨太尉走来，提起把椅子把杨太尉打翻在地，又在李师师家放起火来，吓得宋徽宗夹着尾巴溜走了，宋江的乞降丑剧只得被迫收场。

宋江从东京回梁山不久，得知朝廷派陈太尉前来降诏招安，“未见真实”就欣喜若狂，得意忘形，对众头领说：“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宋江的投降言行遭到了梁山一部分人的反对，他急于要做封建皇帝的奴才，便横蛮压制反投降的议论。并赶忙下令，“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这次投降阴谋又未能得逞。在吴用的安排下，阮小七倒换“御酒”，李逵撕毁诏书，拳打陈太尉，一批反投降的头领杀上忠义堂。宋江见众怒难犯，慌忙与卢俊义死命抱住李逵，拦住大伙，才救了陈宗善一条性命，并“急传将领”，与卢俊义一起护送陈太尉等下山。宋江怕得罪朝廷命官，断了门路，投降不成。在陈太尉面前低三下四，陪罪求情：“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并苦苦哀求陈太尉回朝“善言则个”。《水浒》作者通过这招安与反招安故事情节歌颂宋江的“忠义”，我们却可看到宋江一副可耻的奴才相，真是令人作呕。

陈太尉回朝，宋徽宗见招安不成，又动刀兵了。枢密使童贯、殿帅太尉高俅亲自出马，先后分别统领大军扑向梁山泊，妄图把梁山泊起义军一口吞下。吴用领导起义军英勇抗击，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并把高俅活捉上山的伟大胜利。但是，这胜利却被宋江作为换取“官爵升迁”的资本。梁山起义军经过浴血奋战，活捉了高俅这个沾满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一贯自称反贪官的宋江，急教戴宗传令，“不许杀害”。“见张顺水涿涿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段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筵宴。……大吹大擂，会集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苦留高俅住了三天，设了四次筵席，多次向高俅苦苦哀告：“文面小吏，安敢反逆圣朝。奈缘积累罪犯，逼得如此。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高俅答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这真是“不打不相识”。一个羞羞答答地伸手“要官”，一个表示愿意向皇帝进言“赏官”，所谓“忠良”与“奸臣”在共同扼杀农民起义的前提下握手言欢了。

高俅回朝并没有向皇帝进言，宋江受招安的愿望又未能实现。于是，“一心只要招安”的宋江的乞降活动也就更加紧张频繁。他又急忙派人带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第二次去东京，向李师师和皇帝近臣宿元景行贿。经过李师师、宿太尉的进言，宋徽宗知道了宋江的“忠肝”、“义胆”，宋王朝又搞了第三次招安，终于用欺骗的手段骗取农民军缴械投降了。至此，宋江的叛卖阴谋得逞了，他的投降面目也就彻底暴露了。从以上可以看出宋江这个投降派的丑恶嘴脸。为了爬到皇帝脚下当一名奴才，干尽了种种卑鄙的勾当，无耻之极。

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是他叛卖农民革命的继续，也是他奴才本性发展的必然结

果。宋江投降以后，为了“报效朝廷”，甘当宋王朝的鹰犬，死心塌地为封建王朝效劳，不仅多次压制李逵等人重整旗鼓、再上梁山的动议，而且主动请求充当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

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自号为一国”，与宋王朝势不两立，直接威胁着北宋地主政权的存亡，吓得宋徽宗坐卧不安。听说宋江甘当打手，赵佶大喜。于是，主子下令，奴才出马。宋江这个扑灭农民革命烈火的“及时雨”，戴着“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的桂冠，打着“天兵”的旗号，领兵前去镇压方腊起义，为挽救宋王朝的灭亡替主子卖命。他对方腊的农民军视如寇仇，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狂吹什么“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这时，他一反在梁山宽宥被俘朝廷将官的常态，对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极尽斩尽杀绝之能事，不是“斩首沥血”、“碎剐于市”，就是“剖腹剜心”、“凌迟处死”。这是何等残酷的反革命手段，又是何等可耻的叛徒行径。

《水浒》为了美化宋江，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却把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写成是所谓“保护”人民的“救世主”，把宋江率领的地主武装打扮成受到人民“爱戴”的“仁义之师”，什么“幸得将军到此，使我每再见天日”，什么“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这是作者无耻的歪曲。与此同时，对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则恶毒攻击，肆意诬蔑，开口是“贼”，闭口是“寇”。还胡说什么“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从根本上抹杀了农起义的革命性、正义性，是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起义、挑拨起义军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卑鄙伎俩，也是他们美化自己、欺骗人民的恶劣手段。

宋江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受到了主子的重赏升官，捞到了一个大的官衔——“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而且皇帝还赐钱十万贯，让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主子的赏赐，使得奴才更加感激涕零，为主子卖命也更加卖力：“宋公明……到任之后，惜军爱民，百姓敬之如父母，军校仰之若神明。”在作者的笔下，万恶不赦的叛徒、镇压农民起义的罪魁成了“敬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的庞然大物，为宋江的可憎面目罩上了一层“神明”的外纱，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被抹煞得干干净净，对封建制度的美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水浒》为把宋江塑造成一个“全忠”的艺术典型，还让他临死前念念有词说什么：“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担心他死后，李逵再次造反，坏了他“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把李逵骗来，用“御赐”药酒害死了。《水浒》用这个情节来歌颂宋江至死不忘“忠君”，我们却可以看出他是反动统治阶级死心塌地的奴才，用他自己的手杀害自称“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做为效忠封建王朝的最后行动，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对宋江的吹捧，作者犹嫌不足。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尽忠报国，死而不已。把宋江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农民起义的无耻叛徒吹到天上去了。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宋江最后还是被“御赐”药酒毒死了，这个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

《水浒》最后写宋江等死了以后，天子“梦游梁山泊”，终于为他们“昭雪”，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并特别“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天子还下诏书“宣宋江的弟弟宋清承袭宋江的官爵，不料宋清……不能为官，上表辞谢，只愿郛城为农。上皇怜其孝道，赐钱十万贯，田三千亩，以贍其家，待其有子嗣朝廷

录用。后来宋清生一子宋安平，应过科举，官至秘书学士。”宋江的“忠义”之心，感动了天帝，“天帝哀怜，……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宋江的“忠义”之心，感动了楚人，“楚人怜其忠义，……建立祠堂，四时享祭。”而且还把宋江这个为害人民的叛徒描写成“生为民除害，死为民造福”的偶像，让他“受万万年香火，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不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总括宋江的一生，是罪恶的反革命的一生，上山之前，仇视农民革命，忠心耿耿地为地主阶级效劳；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后，大搞修正主义，疯狂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时机成熟时，他公开叛卖农民起义事业；投降后，就去打王庆、田虎、方腊，充当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总之，宋江是一个至死坚持“忠君”立场的投降派。《水浒》就是通过美化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歌颂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表达它的主题思想的。通过对宋江的剖析，不仅使我们知道了投降派的面目，而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三、几点体会

毛主席教导说：“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毒草可以变成肥料，反面教员可以用来教育人民。通过学习马列、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批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汲取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主要谈三点体会。

1.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水浒》所描写的梁山农民起义军逐步发展壮大到走向失败的全过程，我们可以从反面清楚地看到，路线正确，起义军就发展壮大；路线错了，起义就失败。梁山泊最初的“头领”是“白衣秀士”王伦。他是个没考上秀才的知识分子，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路线，严重阻碍着起义军的发展。晁盖上山时，林冲火併了王伦，晁盖当了梁山起义军的领袖，制定和实行“共聚大义”、“与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纲领和路线。他坚持武装起义，注重起义基地的建设，接纳天下英雄好汉，论功排座，任人唯贤，依靠出身贫苦的农民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同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不断取得胜利，起义队伍发展很快。起义军发达兴旺，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梁山泊成为天下英雄众望所归的农民革命根据地。

晁盖死后，宋江“把寨为头”，窃取了梁山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把晁盖的农民革命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主张招安，效忠赵宋王朝，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蜕变成一支保皇军，充当封建王朝镇压方腊的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终于把轰轰烈烈的梁山农民革命断送了。

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错了，有了人，有了枪，有了政权也会丢掉。《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古代的农民运动史，还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们党五十多年来的斗争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历史

阶段，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关键就在于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要求我们执行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2. 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

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拚命反对晁盖领导的农民起义；他钻进了农民起义队伍之后，就大搞修正主义。他披着农民革命的外衣，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把封建地主阶级用武力镇压所没有扑灭的梁山农民起义烈火扑灭了。

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要实现投降阶级敌人或民族敌人的阴谋，就必然搞修正主义，在革命词句掩盖下篡改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古代的修正主义者是这样，现代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也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水浒》中的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林彪，虽然相隔好几百年，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鼓吹“天命观”，自称是“天魁星”下凡；一个宣扬“天才论”，说自己“脑袋特别灵”。一个用“替天行道”作旗帜；一个以“克己复礼”为纲领。一个说“权借水泊随时避乱”；一个讲“勉从虎穴暂栖身”。一个称宋徽宗“至圣至明”；一个喊蒋介石为“最高统帅”。一个要去“辅国安民”；一个要搞“民富国强”，对地、富、反、坏、右“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一个“口里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窃据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妄图抢班夺权。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修正主义者，出现投降派，这是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揭露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3. 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为什么解放以后甚至经过文化大革命，《水浒》这样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还被有的人当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吹捧，宋江这样一个投降派的典型还被有的人当作“农民起义的领袖”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还被有的人当作农民革命路线宣扬呢？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表现。刘少奇、林彪一类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帝国主义，总是利用封、资、修的反动文化，鼓吹投降主义、叛徒哲学，为他们投降卖国制造舆论。吹捧《水浒》就是其表现之一。我们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大是大非，看不清投降主义的真面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歌颂叛徒宋江同美化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阶级调和论。这说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任务还很艰巨，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批林批孔还要进一步深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